

青之著

# 論新中國

——中國的現在與未來

香港書店出版

# 論 新 中 國

中 國 的 現 在 與 未 來

青 之 著

香 港 書 店 出 版

# 論 新 中 國

版 權 所 有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

著 者 青 之

出 版 者 香 港 書 店

代 售 者 國 內 各 大 書 局

定 價 國 幣 二 元 五 角

## 開闢我們的新言路（代序）

在我們這古老的國度裏，『沈默寡言』向來就被當作一種美德稱頌着。「歷代名臣言行錄」之類的史傳，常是把這四字和『少有大志』、『密達大度』等讚語聯在一起的。先前我很疑心這是立傳者溢美之辭，後來纔知殊不盡然。原來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裏，人們的言行是必須塗上厚厚的身分色彩的；爲人臣者對於君上是不敢多言，而對於下民又不屑多言；要想做一個『寡尤』、『寡悔』的好官，沈默實在是一種最有效的保護色。倘有人以爲『沈默寡言』純粹是個人的天性，與實際政治無關，那是把人的性格給抽象化了，弄成空洞無物的東西。時不論古今，在宦海官場裏，官兒們的俯仰之間，即使是一聲不響，也常有他的『政治意義』的。

我並不鄙薄『沈默寡言』；假如有一位『言不及義』的仁兄和一位『沈默寡言』的朋友在一道，我是甯願從後者領略寂寞，而生怕從前者貽取教益的。但是，在歷史的解剖刀下，我們看得出，所謂沈默寡言的風度，其實往往是某些閹人們掩飾自己的畏怯怯懦的一層油漆——雖然不可一概而論——剝落了這層油漆，透露出來的本相就只令人覺得可鄙可憐。歐陽修就曾在在致尹師魯的信內慨然說過：『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人間，相師成風。』他所說的是宋朝的風氣，但這話未嘗不可拿來嘲諷古往今來一切抱殘守闕之輩。

這種『沈默畏慎』的積習像厚重的淤泥一樣，阻滯中國社會的進步與變革。人們不但不以爲可怪，反視爲當然。結果是，大家滿足於現狀，習慣於黑暗。其末流是對於萬事萬物不置可否，只是一味唯唯諾諾；但求無過，不求有功，正是這一羣人的處世論事之道。倘有人膽敢衝破那籠罩天下的大沈默，他是會給淤泥窒死於寂寞中的。血的經驗告訴官僚士大夫，多言賈禍不如結舌保身，於是沈默寡言不但成了習慣上的美德，而且逐漸成了傳統的戒律了。

在恩威莫測的專制主義之下，奴才不敢多言，奴隸是不許多言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思不出其位』，是告誡奴隸不要嘩啦嘩啦、胡思亂想的聖賢之言。這類聖賢之言確也收到了統治人心的實效，那教澤一直流行到近世；不是連茶樓酒館也高揭『莫談國事』的告白麼？又不是走錯了路也聽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諺語麼？魯迅先生曾經嘲諷過：『造物主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那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是治者階級的最大恨事之一。但是，治者畢竟是厲害的，他們雖不能從無頭的奴隸搾取脂膏，却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用血泊封住小百姓的嘴吧——用古語來說，就叫做『防民之口』，而仍舊叫他們服役，小百姓就永遠有如罩住了嘴吧拖磨拉車的牛馬。『文起八代之衰』的韓退之總算得是忠言獲咎的代表人物了，但你看他爲皇帝老子設想得多麼周到：『民不出米粟麻絲以事其上則誅』。可見完糧、納稅以及當兵、服役才是小百姓們的本分，倘作非分之想嘩啦嘩啦以犯其上呢？用韓退之的口吻來說，也還是『則誅』

。皇帝老子板起龍顏，悶聲不響坐在龍廷上，靠了大小臣工把小百姓壓榨得並無貳話，保住『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的江山，這就是所謂『聖人不言，而天下治』。

『聖人不言』，『賢臣寡言』，而庶民無言，於是天下太平，萬事大吉。

然而，每逢外患方殷、內憂如焚的時候，廣開言路的呼聲就在朝野沸騰起來了。坐在宮殿裏的皇帝，倘不十分麻木，他是會照例『徵諫納善』、『詔求直言』，甚至下一道『罪己詔』的。但是，這些戲文說穿不得，一說穿，可就一錢不值。當金人進犯中原的時候，宋欽宗受內禪的第七日，就曾詔告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但結果是怎樣呢？且看大學生雷觀上書所說的一段話：『詔下逾月，上封事不減千數，而未聞曉然有求言之實，臣竊疑之。豈求言之詔，徒爲文具邪？……求言者徒爲文具，或執事者沮遏不行，天下之人，復鉗口結舌如前日矣。』（雷觀：「論李邦彥張邦昌不可用書」）。這真揭穿了皇帝老子及其奴才們的祕密。在這定於一尊的統治制度之下，所謂言路廣開，根本是沒有的事。至多不過是幾個不避斧鉞的忠臣上幾個奏疏，盡盡道臣。倘是庶人上言，即使不因『冒犯天威』死得莫名其妙，他的『直言』，至多也不過如一粒淚珠之落於大海。『禹聞善言則拜』的美談縱令是可靠的話，也只能想像禹是部落時代的大族長，他就沒有做封建時代的皇帝老子的架子。

不錯，在封建專制時代，朝廷裏的確也置臺諫，設言官，甚至『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好像在表示皇帝虛心納諫，從善如流了。然而所謂言路永遠是狹得像一條擠不進

一人的小胡同。「天高皇帝遠」這句諺語就表明了小百姓和皇帝老子疏隔了十萬八千里。就是專司言責的諫官罷，也不過在一定的禮法下，辦辦例行公事，可說之處就說幾句，不能說之處便諱而不言。倘若愛多說話，不倒楣，那才是怪事。唐朝大詩人白樂天是做過諫官的，他不但用奏章上言，而且用詩歌進聞於上，可見諫議之勤了。但是，他有一回竟在寫給好友元微之的信內告白他的諫議的目的，不過是：「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我看，這「酬恩獎，塞言責」一句話，實在說盡了臺諫之職的精義。這位做過左拾遺的大詩人據說是於「時事無不言」的，但多言的報施是怎樣呢？這只要看他自己所說的：「何圖志未就而悔己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就可窺見消息了。

然而，敢言的人究竟是死不盡的。不管刀斧是多麼兇殘，言路是如何狹窄，我們卻有不少骨頭挺硬的民族先烈在不斷用了悲壯慷慨的言辭，突破那可詛咒的大寂寞，或爲民請命，或爲國攻暴，真是不計成敗利鈍，不避刀斧鼎鑊。誠如歐陽永叔所說：「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中華民族之所以至今尚能生存於天地間，而不淪滅得無聲無臭，就靠了這種壯烈的犧牲精神在不絕和奴氣與鬼氣搏鬥，保持了民族的火種。

從古以來，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內，便有兩種人們在對抗着，一部分人是要使民族變得啞啞以至麻木不仁，弄成一個『無聲的中國』，另一部分人却是要使民族有生氣地活下

去，保全一個『有聲的中國』。一看最近的光景，我們就知道這種鬥爭之劇烈，遠非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所能比擬了。在先前，『庶人不議』、『思不出其位』之類的戒律，在民間是勉強行得通的。可是，時候是民國三十年，也是抗戰的第五個年頭，人民究竟大不同於從前了。他們有主意，有要求，有愛好，有憤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也有選擇好歹的決心，這些是掩藏不住的，也壓伏不了的。我們的民族先哲不是早就說過麼：『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使某些活着的古人和半死的今人發愁的是，這種『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已經作爲一種雄大的力量存在了，害得他們做不成安享國難富貴的好夢。不過，夢是要做下去的，因爲醒對於他們究竟是一種大痛苦。他們不但自己安於夢的生活，也懼怕大眾的覺醒；凡驚殘他們的好夢而又促成大眾的覺醒的人們，在他們看來，自然比外狄更可惡十倍。於是老調子又再唱一遍。我們多的是，祖傳的專制主義的棺材板與墓碑，把這無數的棺材板與墓碑築成一道萬里長城，不是很合於廢物利用之旨麼？自然，這道萬里長城是爲安內而建築的，牠擋不住外來的鐵騎。倒是相反，王道的宣揚者還利用了這安內的長城，不費力地擴大了他們在中國開拓的墳場，掘深了埋葬中國人民的萬人坑。半年前，我們就聽到有人在宣傳今年是中國的『勝利年』，但是，照目前的情勢看來，倘若不推倒那座用棺材板與墓碑築成的安內長城，今年是失敗年——我還不忍說『亡國年』——也說不定，事實確也在毫無情面的指明：中國民族目

前已臨到了空前嚴重的關頭。活路或者死路，聽憑我們自己選擇。在這時期，凡不願陷入萬人坑的中國人，都加倍奮發起來，除了用行動，用工作，用各式各樣的組織來挽救危局而外，還用呼喊，用抗議，用各式各樣的言辭來衝擊籠罩中國的黑暗與死氣。這自然是叫安內的英雄們麻煩透頂的。但他們仍有一定的古法，那就是和截斷大眾的活路一同，趕快封鎖大眾的言路。連抗戰初期載在堂皇的「抗戰建國綱領」上的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的條文，也撕碎得一字不留了。剩下來逞雄的，只有那些擁抱黑暗到底的御用言論機關，御用文人學士。「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魯迅語），這怎麼不教我們想起南宋與明末時代的黑暗來呢？

但是，現在究竟不是南宋明末的時代，大眾的言路是封鎖不完的，正如大眾的活路阻塞不了一樣。自然，今日的言路和古昔的意義可不相同。先前，言路是只能自上而通，一切全要看朝廷高興。大抵必須在所謂「亂極思治」之時，人臣才有較寬廣的進言之路。不用說，所謂進言，也還是向皇帝陛下上幾本奏章。奏書上往往不是寫着「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就是寫着：「無任流涕具陳，不勝惶迫待罪之至」，或者其他類似的請罪話，彷彿每一個進言者都是負罪的囚犯。因為言路之難通，所以臣民也就把皇上詔求直言看做一件非常的大事。這要看陸放翁的「近聞下詔通言路，已卜餘年見太平」的詩句就可想而知了。假如活在現在的人，還是今古不辨，硬以為言路必須由在朝者來打開，非小民所能作主，因而不想衝破那阻塞言路的鐵絲網，只是縮頭縮腦、禁口結舌的甘於沈默，那勢必

只有期待真命天子出世，或者索性把言責交給那些新言官。無奈，從產人參的東北，一直到出雲土的西南，都望不見絲毫王氣，『兒皇帝』與『土皇帝』（較多的是土皇帝）倒有的。至於新言官，即使是很多的罷，他們的心又怎能和我們小民的心相通？如果把言路比作行人的道路，就是在中國，我以為可走之路也不愁沒有的。縱使是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只要耐心走去，總也行得通的，大家又何必等待御道的開放，官路的築成？我們的文化導師不是早就已經指示青年嗎？『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單是走現成的路，自然阻礙甚多，但只要能夠踐踏，能夠開闢，就會到處有新的道路；現在就是我們踐踏和開闢自己的言路和活路的時候。我們的言路是和活路相通的，它不是誠惶誠恐的臣僚士大夫進言之路，而是大衆表達自己意志、訴說民族命運的道路。

現在我們該好好選擇自己的道路了。由那和活路相通的言路走向有聲有色的中國呢，還是由那和死路相通的啞路走向無聲無響的中國呢？

沒有比民族的痞啞更可怕的事了，因為這是滅亡的先兆。一個生龍活虎似的民族，是應當有火熱的言辭，絢爛的文采，爽朗的笑聲，雄壯的歌詠的，就是哭，也應該哭個痛快。現在可難說得很了，少數人就害怕大衆出聲，他們要叫大衆閉住嘴吧。他們所希望於民衆的，第一是沈默，第二是沈默，第三還是沈默，但他們自己却是例外，這樣子，說話也成了了一種特權了。古代羅馬的蓄奴主把奴隸們稱爲『能言的工具』，照目前的情形發展下

去，在中國將來，恐怕連『能言的工具』也要變爲『無言的工具』或『半啞的工具』（也是羅馬奴隸主的用語）。果真如此，中國民族不是要死得無聲無響了嗎？

但是，有生氣勃勃的革命戰士在，中國民族是不會變成培啞的。問題還是在於怎樣去開闢民衆自己的言路。

自然，困難是很多的，卽如言論自由，在大半個中國——不論是在狄人侵占區或在『自由中國』——就缺乏得像大旱時的雨水。然而，在山地裏，那裏會有平坦好走的路呢。言論自由是要靠大衆的合力爭取才能得到的，而這樣的爭取，就應該包括在開闢言路的事業之內。倘有人以爲一定要等言論有了合法的保障以後，才能開拓言路，那是和愚蠢的舟子在逆流中坐待好風吹來送走行舟一樣可笑的。怯弱的人是不敢正視黑暗，糊塗的人是不肯直面光明。其實，惟有能夠正視黑暗的人才能接近光明，也惟有敢於直面光明的人才能擊退黑暗。不論黑暗是多麼濃重，民衆的精神光芒是永生的，這是歷史能夠由黑暗轉向光明的主要根據，也是戰士們懷抱樂觀的主要理由。就是在君主專制時代，言路雖然窄得幾乎等於沒有，民間的是非與憎愛，也還是分得很清的。卽如粗識之無甚至目不識丁的小百姓，就能用民謠、諺語、山歌、小調、俗曲、評話、鼓詞……表達自己的意思。清朝的刀斧不可謂不兇殘，法網不可謂不嚴密，但當時民衆也自有譏訕朝政的胆量和天才。『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之類的聯語是士大夫的傑構也說不定，小百姓大約不會玩那樣工巧的文字遊戲的，但是我聽父親說過，在清末，我鄉就流行過這樣的民謠：『自從出

了李鴻章，十年倒有九年荒」（這一句似乎脫胎於鳳陽花鼓詞），「自從出了盛宣懷，朝堂年年借洋債」，「鴻禧洪福，天下同哭」（「鴻禧」和「合肥」、「常熟」、「常熟」一樣，是意義雙關的字眼，不過後二者是單數，而前者是雙數）。好一個「天下有道」，只消幾句民謠，就給弄得前後穿了。時候到了今天，民智與民力都遠非三十年前所可比，說是沒有恩賜的自由，我們就不能開闢出言路來，這樣的啞吧哲學我是不敢領教的。

事情不是很清楚了麼？要活下去，就須「敢說」，就須打破那用人工凝結的大沈默。「說」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倘使不分是非，不辨幽明，無有愛憎，……即使「妙舌如花」，「下筆如飛」，也只能胡說瞎說一通。難道這一類的胡說瞎說在中國還嫌少了麼？在我看來，牠們多得簡直有如遮天蔽日的蒼蠅。掃蕩這樣的蒼蠅，正是我們的防疫工作。在這裏，傳達真理和保衛革命的喉舌就特別有用，它至少能夠警告大眾去和瘟疫的傳佈者鬥爭。

但是，蒼蠅之所以能夠肆虐，還是因為污水糞穢太多，這是最易蕃殖蒼蠅的，他們久已成了民族健康的大危害了。抗戰的洪水本來把這糞污沖去了一部分，可是，一看最近的情形，它們又隨着黑暗勢力的高漲而趁勢泛騰起來。這就需要毫不留情的暴露。有人是反對在抗戰期間暴露國內的黑暗與污濁的，這還是「家醜不可外揚」的祖傳老思想，倘是真正爲了抗戰的利益着想，我看這樣的老思想是頂沒出息的。臭溝縱橫，糞污滿地，這時活得飄飄然的，是爬上爬下的蛆蟲與飛來飛去的蒼蠅，難道這許多飄飄然的動物，會因爲人

們的隱瞞不宣，而稍稍斂跡嗎？恐怕倒是相反，只有越來越猖獗的罷。凡不願和蛆蟲蒼蠅一同滅亡的，就都有掃蕩糞穢、填平臭溝的責任。而暴露正是不可少的戰鬥形態之一。

不過，單有暴露和清除還不夠的。我們是生活在如此偉大的戰鬥時代裏，其中有苦痛的教訓，有血漬的經驗，有波濤萬狀的鬥爭問題，有頭緒紛繁的歷史矛盾……牠們都在環繞着我們，要求我們找出牠們的規律，而這無數的規律正是爭取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所不可少的。然而，沒落者的一羣却就不願也不能認識這無數的規律，他們在出死力去歪曲歷史的真實，自然不用說這是完全徒勞的，但是他們的言動給予歷史的阻力可並不小。這裏就需要展開死活的鬥爭：把真理從黑暗的重圍中奪取過來，轉變為大眾的武裝力量，或者讓羸政、楊廣、魏忠賢……的鬼魂們把真理鎖閉起來，叫大眾和它隔絕，這將決定中國民族的命運。政治家、文化人、戰士、詩人……如果不能作為民族和大众的喉舌，為了真理與勝利而吶喊，而宣講，而歌唱，他們就是以背向着大時代的。沒有響徹中國震動世界的歷史語言和真理之聲，所謂大時代就不過是一個蒼白着臉色、沙啞着喉嚨的巨人。

這樣很明白，我們所要開闢的言路，必須是運輸真理去武裝大眾的戰鬥之路。

自然，真理不是單靠言辭的力量，就能得到勝利的，同樣的，黑暗與污濁，困難與痛苦，也不是單靠了言辭的力量所能掃蕩、驅除的。倘使只是爲了說得痛快而去爭取言路，即使我們能把歷史的語言和真理的聲音傳播到大眾中間去，又怎能解開民族和大众的鐐銜？那不明明是在鬧着爲言路而言路的笑話麼？

不能和行動統一起來的話辭，不管如何美妙，不過是無根的花枝，很快就枯萎的。要勝利地生活下去，單是『敢說』還不夠，必須加上『敢爲』。驅除舊中國的暮氣，創造新中國的朝氣，就全靠大羣敢說敢爲的戰士的長期苦鬥。

在新中國與舊中國的痛苦的交替過程中，我是願意獻出棉薄的力量，來傳播歷史的語言與真理的聲音的。我不會歌唱，但只知道運用一點學來的歷史解剖知識，來剖析橫在我們面前的一些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問題，舊中國的衰落與新中國的生長的規律，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的命運，這些都成爲我最近半年來研究的對象。這工作在我自然是很吃力的，我既沒有許多年的『寫作之經驗』，又沒有像海涅所說的『發出響聲……輝耀的投槍似的語言』，在艱難無比的言路上來駕馭這吃力的工作，真好像傻頭傻腦的車手，駕着滿載軍火的汽車翻山爬嶺，時刻在戰戰兢兢。然而我還有一點自信的、只要不弄錯方向，小心掌住車機，大的亂子決不會出，而且最後總可到達目的地的。一半是爲了戰鬥的需要，一半是因了朋友的鼓勵，現在我把這半年來關於中國現階段幾個主要問題的論文加以選擇，結集起來，獻呈在讀者諸君面前。

這書裏面幾篇文字，雖是各自獨立的，但它們彼此間也有聯繫。第一篇『新中國的道路』是就新中國的生長過程，提出了幾個較具體的問題，來論斷中國的現狀與前途的。關於中國革命運動在最近發展的新特點，舊中國的沒落與新中國的興起，以及爭取新中國全

面勝利的方針與辦法，都盡我所能理解所能想到的作了一些解說。這一篇未曾發表過（約四萬字）。第二第三兩篇是論述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前途的，曾在一個刊物上發表一部分，因為環境關係未能刊完，現在刪削了一些失去時間性的文句，補充了一些新材料，結印在本書裏。至於第四到第六篇，分別在香港上海的刊物發表過，因為其中所說到的一些問題今天還嚴重地存在着，值得展開討論，所以也刊載於此。

如果這書還能夠盡一點反映時代、保衛光明的言責，作為我們開關的言路的一株小樹而植在道旁，那就讓我拿牠來紀念為新中國而流血的英勇烈士罷！

青之 寫於香港德輔道聽雷閣

本書付排前，已定名為『論新中國』。但後來聽友人說，坊間也有一本題名『新中國』的小冊子發售，為略示區別起見，在書名下加『中國的現在與未來』一個副題，這原是不得已的辦法。

## 目次

代序	.....	一
第一篇 新中國的道路	.....	一
第一節 偉大的民族希望	.....	一
第二節 最近中國革命運動的新歷史特點	.....	五
第三節 新民主主義的必然性與新趨向	.....	一八
第四節 新民主共和國的內容和形式	.....	三二
第五節 爭取新中國的全面勝利	.....	四六
第二篇 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上)	.....	五七
第一節 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規律與決定因素	.....	五七

第二節	民族統一戰線生長的四個階段……………	六七
第三節	統一戰線新形勢的五個特點……………	七四
第四節	民族統一戰線的危機自何而來……………	九三
第五節	反磨擦理論……………	一〇九
第三篇	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下)……………	一三三
第六節	從明末黨爭說到今日國事……………	一三三
第七節	國內時局惡化的內幕……………	一四三
第八節	國共關係與統一戰線的前途……………	一六六
第九節	民族戰爭的前途與全國民衆的任務……………	一九六
第四篇	論民族解放戰爭……………	二一三